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茶陵派学术档案

司马周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本书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茶陵派学术史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ZWC015）；江苏省2014年度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资助项目成果

茶陵派学术档案

司马周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陵派学术档案/司马周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4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ISBN 978-7-307-13974-9

I. 茶… II. 司… III. 茶陵诗派—文学研究 IV. I207.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1941 号

责任编辑:李琼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1.5 字数: 468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3974-9 定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司马周《茶陵派学术档案》

陈文新

给司马博士的《茶陵派学术档案》作序，对我来说，一是义不容辞，二是有感而发。所以当司马博士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时，我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一)

我对茶陵派的关注是从 1997 年开始的。那时正应约撰写《明代诗学》一书，各种明代的集部文献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堆满案头。在没日没夜地看了那些材料后，对茶陵派盟主李东阳不禁油然而生敬意，他在诗学理论上的建树，尤其令人为之神爽。当时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以往我们对李东阳和茶陵派的评价与其实际成就是不相称的，他们应该享有较为公允的历史地位。

2000 年 11 月，拙著《明代诗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系统讨论明代诗学的著作中，李东阳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至少在下述几个方面，李东阳的建树得到了较为显著的说明。

其一，李东阳对恬淡闲适的风格表示好感，与三杨等前辈台阁诗人明显不同。

《明代诗学》指出，与身份意识的淡化相一致，李东阳等茶陵诗人虽也身居台阁，但其作品风格却不再以“廊庙”和“富贵福泽之气”为圆心，倒是洋溢着徜徉山林的风味。李东阳对源于“淡”的风致的偏爱，在《麓堂诗话》中有明确而精彩的表达：

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

靡，孟却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则孟为尤胜。储光羲有孟之古而深远不及，岑参有王之缛而又以华靡掩之。故杜子美称“吾怜孟浩然”，称“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储岑，有以也夫。

李东阳称李白、杜甫为大家，这不过是对一个传统说法表示附议，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值得注意的倒是他居然视孟浩然、王维为大家。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据中国文学批评史看来，李白、杜甫堪称大家，而孟浩然、王维则仅为名家，视孟浩然、王维为大家，这是对古典诗学传统的颠覆。并且，他对孟、王的赞许集中在“古澹”与“悠远深厚”，正是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所谓“优游不迫”。他所举的那些诗例，也大体属于山水田园诗的范畴。李东阳以台阁要员而青睐古典诗的隐逸传统，表明台阁要员的身份对他的束缚已大为减弱。“廊庙与山林”的对峙状态在李东阳的意念中已不存在。

其二，李东阳对诗、文之异的辨析相当细致、深入和周密。

李东阳在《沧州诗集序》中考察了创作中的两种矛盾情形。一方面，“有长于记述，短于吟讽，终其身而不能变者”，似乎写诗极难；另一方面，“或庸言谚语，老妇稚子之所通解，以为绝妙”，又似乎十分容易。其《麓堂诗话》也说：“诗与文不同体，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固未然。然其所得成就，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近见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为诗，则毫厘千里，终其身而不悟。”诗文体性不同，对作者才情的要求也就不同。诗人是和某种特殊的天分联系在一起的，即严羽所谓“诗有别才”，“老妇稚子”不经意的吟咏，可能是一首好诗，而一个学富五车的古文好手，也许终生写不出一首优秀的七律。反过来也可以说：出色的诗人未必写得出出色的文章。李东阳概括地指出这两种现象，并由此切入揭示诗、文的体性之异，他的理论贡献应受到后人的尊重。

其三，在深入认识诗与文不同审美特征的基础上，李东阳提出了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重要命题。

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

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寄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这里，“情思”包含了“情感”，但其含义又非“情感”二字所能取代，因为，它同时还强调了感觉和音乐效果。“比兴”与“情思”的联系指向对诗人感觉的关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与“情思”的联系则表明情感、情绪与音乐相通。

李东阳论诗的音乐性，其立论依据乃儒家经典《乐记》。《麓堂诗话》明白无疑地说：“观《乐记》乐声处，便识得诗法。”而《乐记》的基本思想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乐是抒情色彩最为浓郁的一门艺术。当诗人别出心裁地创造出某种节奏和韵律时，当他根据感觉来调节音响时，诗除了被定义为语言的艺术外，也应同时被定义为音乐的或音乐化的艺术。它与我们的“情思”是密切相关的。

《明代诗学》不是一部专论李东阳和茶陵派的著作，对李东阳和茶陵派的讨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当然不可能做到全面细致。但也正因为是在明代诗学的整体视野下考察李东阳和茶陵派，主要是从大处着眼，倒也对其历史地位有了特别清醒的意识。《中国学术档案大系》之所以专列《茶陵派学术档案》，就是基于这一学术理念。茶陵派是有资格进入《中国学术档案大系》的。

(二)

《茶陵派学术档案》约请司马博士来做，是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茶陵派研究专家之一。

司马博士先后在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硕博阶段均师从在明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陈书录教授，博士论文题目为《茶陵派研究》。2003年进入苏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合作导师杨海明先生，研究课题为《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仍延续了他硕博阶段的旨趣。其学术专著《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201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司马博士曾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提到了其选题背后的学术考量。大体说来，他做这样的选择，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茶陵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文学史上并没有给予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茶陵派作家群体的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寂寞的状态，有待深入和拓展。第二，大多数关于茶陵派的研究论文或著作，对茶陵派的认识较为浮泛，未能对下述问题予以系统考察：茶陵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之间是什么关系？李东阳作为一代诗坛盟主，为什么将诗歌创作的视角转向艺术本体的追求？他对艺术规律的探讨在其所处时代有何意义？第三，陈书录先生在明代诗文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声誉，其专著《明代诗文的演变》中专门谈到李东阳及其茶陵派，导师的学术建树使司马博士有足够的信心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第四，茶陵派盟主李东阳祖籍湖南茶陵，是“楚人而燕产”（《李东阳集·文后稿》卷八《蜀山苏公祠堂记》），其浓郁的乡土情结在文学创作中时有体现。李东阳生既非茶陵，长亦非茶陵，而有着如此深厚的故乡之思，原因何在？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司马博士所说的四点原因，都实在而亲切，令人信服。

《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这部专著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主体，也包含了博士后期间的部分成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司马博士多年来对李东阳及茶陵派思考的结果。其长处主要在下述四个方面。

一是资料翔实。茶陵派成员众多，有关文献资料相当繁杂，许多重点与难点问题需要用翔实的文献资料加以说明。在著作中，作者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资料考订工作颇为扎实，去伪存真，亦颇见功力。例如第二章《茶陵派成员考论》，有关茶陵派成员组成的考订，虽学术界也有人对此进行研究，却较长时间尚无定论，司马博士以《李东阳文集》中有关的诗文交游为依据，多方钩稽明、清文人的别集、笔记和相关地方志等，对茶陵派形成时间、成员身份以及茶陵派成员的构成进行了详细梳理，言之有据，结论可信。又如第一章第三节，关于李东阳著述情况的搜集，虽学术界已有成说，但他从原始文献的整理着手，重新搜集、辨析和考证，在搜罗现存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李东阳编著诗文情况仔细爬梳，以详尽的考证订补了时人的缺

漏，并用表格形式展示存佚情况，眉目清楚。还有如关于“茶陵派”名称源与流的考辨、李东阳乐府诗的典故出处、李东阳辞赋的汇总表等内容均是有考有辨，有论有据，不流于空谈。这部著作建立在比较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确保了其学术价值。

二是角度新颖。论著既注重茶陵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个体研究，又注重分析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的交互关系，将茶陵派置于整个明中期文坛这一文学发展过程中加以探究，从纵向历时性维度与横向共时性维度两个层面对茶陵派进行比较研究和整体探讨，体现了较强的文学史通变意识，从而使读者能清晰地把握茶陵派在明代文学进程中的地位。比如论著第一、二、三、四章是从茶陵派形成、成员构成、诗歌创作、诗话理论等方面对茶陵派予以整体研究，挖掘茶陵派在明代中期文坛诗鲜明而独特的一面，而第五、六、七章，则是通过对茶陵派与台阁体、前七子、吴中文学在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方面具体而微的比较，研究了茶陵派与台阁体、前七子、吴中文学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上的交融、纠偏和重构关系，较好地揭示了茶陵派在明代中期文学发展流变中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力。

三是论从史出。著作以对史料的挖掘和文本的解读为基础，揭示了茶陵派在明中期文坛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还对茶陵派与当时文坛流派的错综复杂关系作了深入研究，突出了明中期文坛文风的丰富性和不可逆转的演变趋势，展现了明中期文坛的真实历史。如第一章《茶陵派的形成》关于茶陵派流派形成背景的研究，用史学的方法详细考察了茶陵派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既注意茶陵派在社会大背景下所反映的共性，又突出其在明中期文坛独树一帜的个性。第三章《论李东阳的创作》、第四章《论茶陵派的诗论纲领》，既没有因为个人的喜爱而夸大对茶陵派的称颂，也没有因为历史的尘埃而模糊了对茶陵派本来面目的还原，尽可能地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努力在求实中创新。

四是评论公允。该著致力于对材料进行周密的分析研究，尤其是致力于对茶陵派诗歌创作与理论特色的分析，突出了茶陵派成员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们创作素材、创作手法上的独到之处。作者在论述李东阳辞赋试图摆脱台阁体风气时，结合《拟恨赋有序》、《忠爱祠赋有

序》、《冷庵辞》、《见南轩赋》、《东山草堂赋》等文本展开分析，评论周密允。第四章关于《麓堂诗话》名称流变的考述，按名称的不同，对众多史料细加辨别，陈述清晰，论断明确。特别是论著中对于茶陵派与前七子成员关系的考证，从两派文集入手，详细分析两派成员间的密切交往，从而印证两派在诗歌创作上的相互交融与相互刺激，条分缕析，颇为允当。

司马博士的《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既表明他在茶陵派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又证明了他有能力做好《茶陵派学术档案》。现在这部档案就要出版了，期待它得到读者的喜爱，也期待它对茶陵派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是为序。

2014年10月16日于武汉大学

序

陈书录

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①

成化、正德年间，由于宦官中先是汪直专权，继之以刘瑾等“八虎”肆虐，加之明武宗的荒淫，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盛行时庙堂文化中“盛世”的幻影消失了，士大夫中的儒家正统派群起而要求打击宦官，革除弊政，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声浪冲击着庙堂文化。因而，附丽于庙堂文化的台阁体文学的独尊的地位动摇了，从而使正宗文坛上的主流派由台阁体转而为以李东阳为领袖的茶陵派。当然，茶陵派对于台阁体既有纠偏起衰的一面，又有守成因袭的一面，情况颇为复杂。从20世纪初至今的一百多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茶陵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谱写了一部茶陵派研究的学术史。司马博士对此进行认真的梳理，并从中撷其精华，精心评介，由此编撰而成的《茶陵派学术档案》显示出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资料翔实而丰富，《茶陵派学术档案》占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地搜罗了百年来有关李东阳及茶陵派研究的学术成果。茶陵派在明代文坛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日益引起明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相关论文颇多。《茶陵派学术档案》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了这些研究资料，既注重研究资料的深度，又体现研究领域的广度，代表性与多样性并重，学术性与可读性并存，以期更好地推进茶陵派研

^① 李梦阳：《徐子将适湖湘，余实念念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空同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究。例如，《茶陵派学术档案》在茶陵派基础文献研究方面的资料就十分丰富、全面，其中既有关于茶陵派主要成员生平、著述方面的文献（如钱振民的《李东阳年谱》、雷磊的《茶陵派成员考辨》），也有关于茶陵派文学理论及创作方面的研究资料（如李庆立的《怀麓堂诗话校释》、马云骏的《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亦不乏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的横向比较研究的文献（如陈文新的《从台阁体到茶陵派——论山林诗的特征及其在明诗发展史上的意义》、司马周的《明中期文坛茶陵派与吴中派关系研究》）。编撰者在选择这些论文或论著的过程中，注意选材的角度，挑选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是以多角度、全方位为原则，翔实而丰富，颇见甄审之功。又如，《茶陵派学术档案》所选录的资料并不囿于单一的文学范畴，还以开阔的视野从史学、艺术学等领域发掘文献，进一步增强著作的全面性与广泛性。如所选赵中男的《刘瑾乱政时期的李东阳》一文即是从史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挖掘，真实地再现明中期文坛的历史风貌，并将李东阳置于这一历史大环境下论述其政治活动与个人品格。艺术领域研究如《茶陵派百年研究回顾》中特别提到茶陵派的书法艺术，并指出这一方面还有很多的研究空间。此外，《茶陵派学术档案》的体例安排也体现出资料搜集的丰富性，首先附有《茶陵派百年研究回顾》，对整个茶陵研究史进行了宏观的把握和全面的审视，继而详列单篇论文论著并作细致的介绍与评析，文末还列出作者相关研究文献索引，再次搜罗茶陵派研究论著提要，最后较为详尽地列出了有关茶陵派研究的大事记，从而构成一个完备而丰富的研究体系。

其二，学术史脉络清晰，《茶陵派学术档案》对百年来的茶陵派研究历史进行了梳理，完整地描绘出学术界关于李东阳及茶陵派研究史的脉络。纵观百年研究史，前七十年关注较少，成果寥寥，近三十年才蔚为可观。《茶陵派学术档案》所选录的学术论文均为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角度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同时，在评介这些重要论著过程中，编撰者既考虑纵横不同的层面，又旁及其他未能单列出来的相关研究，全书非常清晰地勾画出茶陵派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例如，在《茶陵派百年研究回顾》中，通过对百年来研究成果

的整理归纳，从茶陵派成员生平及著作整理、成员构成情况、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成员书法、流派的历史地位六大方面展开具体论述，钩沉要指，对其研究重点、难点、热点一一进行解析，力争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出百年来茶陵派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之上，编撰者还提出个人对研究现状的意见与看法，学术史脉络相当清晰。再如《茶陵派学术档案》所单列的论著，或重人物生平，或重文学思想，或重历史背景考证，以时间为纵轴，研究角度为横轴，涵盖茶陵研究史的许多重点，在横纵轴交错中展示百年来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又如，在对廖可斌《茶陵派与复古派》一文进行评介时，《茶陵派学术档案》指出廖可斌此文乃是国内较早专门研究茶陵派与复古派之间关系的论文，并点明这一论题一直是茶陵派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从而结合其他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一一介绍点评，学术史观念非常明晰。而所附的《百年来茶陵派研究论著提要》、《百年来茶陵派研究学术大事记》两文，尽管是资料的搜集与罗列，但《茶陵派学术档案》在编排资料过程中，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学术界对茶陵派研究的发展态势，既有利于我们从中了解学术界关于茶陵派的研究动向，又有利于促进学术界对茶陵派的深入探讨。要之，该书通过对茶陵派研究历史上重要著作的评介和相关研究资料的搜集来揭示茶陵派学术史脉络。

其三，评介体系完整、科学，《茶陵派学术档案》对文献进行系统的介绍与评析，逻辑清楚，有理有据。首先评介者对所选录文献的作者个人情况、学术经历介绍十分详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介绍并非漫无目的，而是紧扣专家学者为何及怎样研究茶陵派这一中心，同时又能注意考察学人之间的师承关系、学术渊源，从而更完整地介绍茶陵派研究历史。在具体的评析过程中，《茶陵派学术档案》能对文献进行细致周密的分析论证，善于提炼、综合作者的观点及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指出其优点或不足，颇为允当。同时，该书还能触类旁通，联系其他相关研究文献，一一进行比较分析，由点及面，视野开阔，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科学的评介体系。如在《李东阳年谱》一文的评介中，《茶陵派学术档案》就特别提到作者钱振民与蒋天枢、章培恒等间的师承关系及作者所在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所的学术传统，揭示出钱振民研究茶陵派的渊源与契机。再如对周寅宾《李

东阳与茶陵派》一书的分析，《茶陵派学术档案》首先对周寅宾的个人情况及学术经历进行说明，继而重点介绍其茶陵派研究概况，指出周寅宾主要致力于《李东阳集》的整理校勘工作，为李东阳及茶陵派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紧接着，分析周寅宾相关的单篇学术论文，最后引出周寅宾的新著《李东阳与茶陵派》。在细致介绍专著研究内容的基础之上，提炼出周著的三个主要特色：文献考据与理论分析并重；个案研究与整体考察同举；纵向比较与横向类比结合。并指出其著作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为进一步研究茶陵派提供思考的空间。又如，在对郭瑞林《应给“茶陵派”重新命名》一文的评析过程中，《茶陵派学术档案》始终持有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在充分了解学术界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后，能够既立足于郭文，又能旁及陈文新、薛泉等其他学者对茶陵派是否为一个流派这一问题的看法，科学论证，令人信服。由此可见，《茶陵派学术档案》确是构建出一个详细完整而又科学的评介体系。

其四，文献的客观性与著作的学术立场有机结合，《茶陵派学术档案》虽属于学术档案性质，重在搜集罗列文献资料，梳理研究史的脉络。但每篇论著后都附有评论者的相关评介，这样就将文献整理与评介者个人的学术观点结合起来，不同于一般单纯的资料汇编，处处渗透着个人学术观点，更见功力。这样的学术著作体式也十分新颖，熔资料搜集、文献分析于一炉，呈现出编撰者的学术立场，更具学术价值。例如，在评介者对顾易生、孙克强的《试谈李东阳的辞赋》一文的论述分析中，就引用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对顾、郭二人的观点提出质疑：顾、郭认为李东阳的辞赋共 19 篇，评介者提出不同意见，并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绘成表格，认为李东阳辞赋应为 24 篇，纠正顾、郭二人的观点。可见，评介者在具体评析过程中始终持有一个的严谨而缜密的思考，展现自己的学术观点。又如，编撰者在分析赵伯陶的《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融通意识》这篇论文过程中，列举自己博士论文中考证诗话版本的相关章节来支持、补充赵伯陶的观点。此外，对于一些权威性的著作，评介者也敢于客观地指出其不足，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如钱振民的《李东阳年谱》是学术界目前所见李东阳年谱中一部资料翔实、论断科学、超越前人的著述，但

评介者客观地指出它毕竟还只是一部资料性基础研究，对于谱主李东阳及茶陵派的认识、评论还不可能得以展开。同时，评介者还提出自己所发现的一些文献资料来说明钱著的某些不足。由此观之，《茶陵派学术档案》确是将文献整理工作与个人学术立场有机融合，使其不再是机械地搜罗资料，而是闪耀着编撰者的思想之光，为茶陵派研究开拓新思路，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衷心希望司马博士以这部《茶陵派学术档案》为新的起点，不断推进茶陵派的学术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于甲午年“河上秋风雁几行”之时

目 录

茶陵派百年研究回顾	(1)
百年来茶陵派研究经典论著评介	(49)
李东阳与茶陵派（存目）	周寅宾 (51)
【评 介】	(51)
谢铎及茶陵诗派（存目）	林家骊 (59)
【评 介】	(59)
李东阳年谱（存目）	钱振民 (67)
【评 介】	(67)
李东阳研究	
——以政治心态、文学思想为核心（存目）	
.....	薛 泉 (76)
【评 介】	(76)
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存目）	司马周 (84)
【评 介】	(84)
茶陵派与复古派	廖可斌 (92)
【评 介】	(102)
从台阁体到茶陵派	
——论山林诗的特征及其在明诗发展史上的意义	
.....	陈文新 (112)
【评 介】	(126)
应给“茶陵派”重新命名	郭瑞林 (134)
【评 介】	(137)
刘瑾乱政时期的李东阳	赵中男 (146)
【评 介】	(155)

试谈李东阳的辞赋	顾易生 孙克强	(163)
【评 介】		(169)
李东阳诗论得失评	王英志	(179)
【评 介】		(191)
试论李东阳的格调思想	李剑波	(201)
【评 介】		(208)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融通意识	赵伯陶	(216)
【评 介】		(229)
李东阳诗学体系论	李庆立	(242)
【评 介】		(272)
尊崇气节，致力于儒雅文学的复壮		
——由茶陵派向前七子过渡的杨一清	陈书录	(283)
【评 介】		(295)
百年来茶陵派研究论著提要		(307)
百年茶陵派研究学术大事记		(417)
后记		(485)

茶陵派百年研究回顾

明初台阁体文学向明中叶复古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而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则在此过渡时期担当了历史赋予的重任，扮演了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文坛由台阁体“啴缓冗沓、雍容平易”的创作文风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复古风气的转型得以顺利实现。茶陵派这一过渡流派的特殊地位引起了明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学术界对于茶陵派的研究虽非十分火热，但上升趋势明显，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大幅增加。

纵览百年研究历史（1912—2012），在前70年，研究者对茶陵派的关注非常之少，成果不多；只有近30年才成果斐然。在笔者所见的研究论文中，仅有2篇论文是关于茶陵派研究的综述文章。邓绍秋的《明代李东阳茶陵诗派研究百年回顾》^①。回顾了百年来（1900—1999）学术界对明代李东阳及其茶陵诗派研究的情况，包括对李东阳文学理论渊源、主要文学理论及其与前后七子关系的研究，并指出了这些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后来此文部分成果收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②一书。该文首次对李东阳及茶陵派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发轫之功，功不可没。但论文对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学术专著都疏漏较多，分析不够全面，不能准确反映学术界有关李东阳及茶陵派的研究现状。针对此文的不足，本人在2003年搜集博士论文材料期间，专门撰写了《20世

^①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第60~63页。

^② 邓绍基、史铁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663~667页。